

读点大师



岁月留声

王学泰 著

这里浓缩了中国社会近六十年的风雨变迁，描绘了那个激情年代的人生百态，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细细品读这些珍贵的独家资料，在流金岁月中慢慢感悟人生，接受时代洗礼！

王学泰自选集

北平往事

再说“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锻炼

激情年代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澡堂子

金鸡未叫汤先热，红日初升客满堂

旧书坊

讲述那些埋藏在心底的记忆

忆师友

平生风义兼师友，遍插茱萸少一人

再现国家记忆
讲述文人旧梦
时代悲歌
世事沉浮

萃取名家著述精华·分享传统文化智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留声/王学泰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王学泰自选集)

ISBN 978-7-5113-2094-0

I. ①岁… II. ①王…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5693号

●王学泰自选集·岁月留声

著 者/王学泰

出 版 人/方 鸣

特约监制/祁定江

选题策划/黄海龙 刘连生

责任编辑/王亚丹

特约编辑/郑英祖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10.75 字数/230千字

印 刷/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094-0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2605959 传 真:(010) 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少年游

少年旧事忆城南

关帝庙记事

我与“第一本书”

天 桥 杂 忆

附中小记

生活的第一课

野驴顾惟乔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坎坷半生唯嗜书

特殊年代的琉璃厂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由酷暑而想到……

困难时期与解散食堂

开心斋与赤心斋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老去文章浑漫与

我和《推背图》

永难忘却的那一个阴云密布的下

一蓑烟雨任平生

京华忆旧

看电影的记忆

大墙里面看电影

娱乐记往录

续“洗澡”

我的“北京的符号”

老北京胡同的最后留影

再说“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远去百年的贡院 213

建一座古旧书业的博物馆

无可奈何花落去
从朱雀桥说到天桥
“恢复玉河北段河道”献疑
“最美”的什刹海，生活也要最舒适
从标语治国到标语抒情
也说老北京的“梦华录”
关于“怀旧”这个主题

往哲昔贤

齐如山
哲人其萎
雨横风狂三月暮
——怀念李慎之先生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
——敬悼王元化先生
平生风义兼师友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迟到的悼念
——悼柏杨先生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高楼风雨感斯文
——追念陈乐民先生
落红不是无情物
——读陈乐民先生最后两本书
老北京的幽默
敬业的出版人郭强

少年游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

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20世纪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旧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 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

愤懑。

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儿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一百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一百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副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 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底儿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人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

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儿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四十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20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 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是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他”),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龕。灶王爷龕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龕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

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腊八以后，小年之前，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龕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 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女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用的走马灯等）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族人，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当儿，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龕、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鞭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

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

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的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 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四十年代的春节（下）

1. 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儿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的墙上。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

其实三十这天很少有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我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

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

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下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一般人欠账，大多是过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无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饮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的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呐！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辞，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龕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2. 大年初一头一天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据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唯一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

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每枚上铸着“廿分”），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元到100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的一种）等，再不是遥不可及了。

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升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升到当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有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给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脚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

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

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的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年夜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间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赌博——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是纯粹的赌博，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3. 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作为回敬。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等候，去“争烧头炷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车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儿一拨儿的，让小孩不知道哪拨儿好。北平近郊农民热衷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他们踩高跷、跑旱船、打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最后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

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大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关帝庙记事

现在我家在武圣路，解放初曾住过关帝庙，还写过两篇谈关公崇拜的文章，我和关老爷可以说有点缘分。

—

这座关帝庙坐西朝东，占地很大，比正阳门的关帝庙大两三倍，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这座关帝庙也有三座山门，此庙中间的大门已封死，门道存放杂乱东西；出入走左门，右门改造成一大间朝东门面房，租给一家纳鞋铺。

庙有四个院落，前、后大殿前面的空地就是一个院子，前殿两侧各有一条窄小通道连接了后院、后殿。后院左侧有两个小跨院，按照关帝庙的形制，原来可能是供奉关公的结义兄弟刘备、张飞、赵子龙和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这两个小院早就租给一家织布厂了。

北京的关帝庙很怪，大多与观世音菩萨同处一庙。可能是受了满族人的影响，因为满族人崇拜的诸神中，第一是释迦牟尼，第二是观世音菩萨，第三是关帝圣君。这个庙前殿供的是观世音，两边侍立着金童玉女；后殿供的才是关公。供的还是关公标准像——右手捋着长髯，左手拿着《春秋》，身子稍稍前倾，仿佛在认真阅读。后面侍立的则是周仓、关平。

庙里约有五六十间房，除了前后大殿还供着观音、关帝和主持住着的三间房外，都出租了。织布厂占了一二十间，住家户共有八家，住的多寡不等。我们租了四间半房，是后殿的南配殿。房屋高大，每间有十六七平方米，较普通的民房宽大很多，很舒适。

关帝庙环境非常好，前后院有八九种树，十来种花。前院山门之后是一棵三四百年的老榆树，两人抱不过来，其侧有杨树、柳树，春天一到杨柳飘絮，榆荚漫天飞舞。前殿正面两侧各有一丛海棠，海棠花开繁盛，一场春雨，花落缤纷，正是“胭脂泪，留人醉”；右侧海棠之后，大殿之前还有一棵挺拔高耸的桑树。后院有枣、桃、松、柏。花则有迎春、榆叶梅、丁香、芍药、牡丹等，一入春则花开不断，当“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之时，桑葚也就熟了，手脚矫健的孩子爬上树，使劲儿摇晃，熟透的果实纷如雨落，孩子围着树，弯着腰，一边捡一边吃，非吃得嘴唇发紫才回家，于是少不了挨一通骂。诗云“开到茶花事了”，但入夏之后，家里盆栽的茉莉、夹竹桃、石榴、玉簪棒等也都到了花期，更是满院芳香。

—

庙的住持是位尼姑，当时也有六七十岁了，她只一人，没有徒弟。父亲称她为“老当家的”，我们称呼她“师爷”。我看她和老奶奶一样，很奇怪，问父亲。他回答：“没成过家（没结过婚），就是‘爷’。”每当她取房钱时，我上赶着叫“师爷”，她必慈祥地笑一笑，用皱巴巴的手摸摸我的头。

师爷每天不言不语地进进出出，在前后殿烧香击磬，有时也敲着木鱼念经，但声音很小，只有我们趴在窗户上偷窥时，才能听得见。平时她就在禅房里打坐，悄悄地往来，仿佛不存在。我见她发过一次脾气。一天在门口买菜时师爷有点挑三拣四，小贩不耐烦了：“老太太，您别这样挑了。”师爷突然停下手，火了：“老太太，老太太，眼睛瞎也瞎了，你们家有这样的老太太！”小贩马上意识到错了，连连道歉：“老师傅，老当家的，我眼睛瞎了，对不起，对不起。”1952年秋，师爷圆寂了。她俗家没有亲戚，病重时，来了个比她稍年轻一些的尼姑，脸上有点麻子，说是住持的师弟。师爷的丧事与俗家没有什么区别。她的棺材停在前殿的廊下，做了三天的法事，念往生咒，放焰口，驱魔打鬼，我们看了全过程。后来庙里的住持就是她那位“麻师弟”了。

不管是“师爷”还是“麻师弟”与房客们有着很好的关系，从来没有因为房租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了。她们采取的都是有就给，没有就等；“师爷”圆寂了，也没把债权留给“麻师弟”，有的租户欠的房钱也就一风吹了。

“麻师弟”没有住持多久，庙产就归公了。由房管局管，房管局接手后，那是欠一分钱也不行的。如果欠了房租，马上轰你搬家。如果你赖着不走，他们会出许多阴招、损招赶你走，院中有个小编辑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唯有房管局的能和他们一比”。后来才知道，当时房管局招收的多是原来底层游民。

三

回忆起来，关帝庙就像个小公园，当时却有三件事使我讨厌，也很难忘。

1. 织布厂嘈杂机器声

街坊里，占房最多的是织布厂，它雄踞两个小跨院。老板是两兄弟，都六十多岁了，长得很像，大高个，柳罐斗子（取水器）的脑袋，小平头，夏天穿一身有浅色长格的中式绸裤褂。老俩在后殿高台阶一站，我们小孩分不清谁是谁。每天早早洗漱完毕，老俩就站在高台阶上，等着、看着他们的工人上班。工人缓缓地从前院到后院，再往北一拐，进入小跨院，不一会儿，工人到齐，老板拉开电闸，织布机便嘎嘎响了起来，此时虫鸣鸟叫都盖了下去，只有单调的嘎嘎声，这一响就是八小时，从不间断，真是烦死了。到了“斜阳却照深深院”之时，织布机声停了，这时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

下班时，老哥俩还是站在同一个位置目送工人出车间，从后院走到前院。工人走干净后，他们进车间巡视一番，关上跨院的大门，拉断电闸，一天便过去了。这样日复一日，院里人默默忍受着噪声。突然有一天搞“三反五反”了，俩老头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安详，不露面了，躲在后殿北侧他们住的小屋里，平时不声不响的工人，把他们从小屋掏了出来，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大老虎。“老虎”是“三反五反”时特殊的政治术语，指不法资本家或有问题的人，挖出了老虎就是运动的成绩。但我们小孩很奇怪，平和的老头，怎么成了“大老虎”了？他们吃人吗？后来不知他们哪去了。不久，织布厂停了，大家高兴了，再也听不到嘎嘎织布机的轰鸣了。不过此时方觉得夏末秋初像持久汽笛一样的蝉鸣和每天对着窗户唠叨不停的喜鹊、老鸱也挺招人烦的。

2. 花香抵挡不住的臭味

说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听起来宛如仙境。其实，生活并非单面，院中还常常有令人喘不过气儿的臭味。

一是老赵家的做酱，赵家人口多，剩的干饽饽、硬饼子也就多，每年春末他家都要把这些剩的发霉的食物，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加盐和发酵物，装在缸里，并在夏日强光下晒，正像现在电视上某牌子酱做的广告似的“老方法就是笨，要晒足一百八十天”。在晒的时候，还要不停地搅拌，臭气冲天。而且这两缸酱就放在前殿后座的台阶上，是我们从后院到前院的必经之地。我每走到这里都是掩鼻而过。在前院与后院相接之处住的邵家是绍兴人，饮食习惯与北方人迥异，经常弄出一些怪味，让全院的街坊分享。他们炸臭豆腐，特别招人不得见，那种臭味一发出来，我们这些口没遮拦的小孩称之为“煮尿盆”。这个味儿与做酱的味儿加在一起，真是令人不可向迩。后读辛弃疾的《鹧鸪天》“掩鼻人间臭腐场，古来唯有酒偏香”，我不喝酒，不知道是否酒就能抵挡奇臭！

3. 吵架

关帝庙里街坊之间相处得不错，吵架主要是老赵家的内讧。这家不说天天吵，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一星期还得动回凶器——或是切菜刀，或是顶门杠。吵架不分昼夜，“有时半夜一声吼，吓得婴孩哭一宿”，您说讨厌不讨厌？分析起来，吵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家庭结构有问题；二是家里处事原则不对。

赵家住了七八间房，家有十来口人。老头有两个妻子，是亲姐俩，共事一夫。这就是家庭结构中的天然不稳定因素。别看妻子是姐俩，她们与各自孩子之间，简直不共戴天。姐姐生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大男是电工，因为“偷电”，判了徒刑，当时正在服刑，他还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也住在家里；老二叫小虎子，十四五岁上中学，是与二房打架的主力，老头子骂他是“流氓、混混”，但他对街坊是有长有少，通情达理。三个女儿，老大嫁了出去，老二工作了，有了丈夫，也住在本院，老三上高小，别看是个小姑娘，也能打能闹能骂，“骂人半天不重样（重复）”。二房生了两男一女，老大十来岁上小学，二房中他是打架的主力，但身体单薄，年龄小，绝不是哥哥的对手；老二是一年级小姑娘，老三才三四岁。可见从人口结构上，二房处在劣势，绝非大房的对手，然而老头，也就是家长站在二房一边，于是双方势均力敌。这种家庭结构能不打架？

如果主事的家长有点儿公平心，一视同仁，注重亲情，或者有点儿手腕、技巧，也许矛盾不会闹得如此激烈。

老头五十来岁，在电信局工作，号称铁饭碗，解放前北平能称铁饭碗者只有三家，铁路局、邮局、电信局。老头爱好古乐，是古琴研究会的。每天他在家里摔打胶泥，自己制作埙。常常拉来一车胶土，先过筛子后过箩，筛出好泥，做成桃形，里面裹以锯末，阴干后做好音孔，再上火烧。十天半个月也烧不出一两个成品。平时老头表情仿佛别人欠他二百吊钱似的，凡人不理，大家也不敢与他说话。可是每当烧成功一个时，脸上就会绽开一丝笑容，这好像黄梅天的阳光。这时他可能会说一两句：“几千年了，我总算把它做出来了。”在住关帝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埙，是不是，埙是由他先开发出来的？现在我也不知道。

老头经济条件和修养与他的家庭施政方针真是有点儿不和谐。在他主持下，家里按着收入和对家庭的

贡献吃四等饭。第一等是二闺女，理由是她有好工作，收入不低，尤其是二姐夫，是私人企业的“高管”（那时北京的私企，规模大的也就几十个雇员，所谓高管也不过就是副经理、掌柜的一类），收入二三百万（现在的二三百元。当时私企与国营比较，同样工作，收入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十），那时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了，自然要“好吃好喝好待承”了。第二等是老头与二房诸子女；三等是大房及诸子女；四等是大哥留在家中大嫂及子女，也就是老头的大儿媳及孙子孙女。老头还有个爸爸，已经卧病在床，老头根本不经心。他的饭，没有等级，哪个等级剩什么，他就吃什么。而常有剩饭的却是大儿媳妇一家，我们常常看见，大重孙子端着剩饭给老爷爷送去，街坊常感辛酸。

这种家庭结构和治家方针，使得火药遍地，不知道哪天就会有突发事件。有一天，我从赵家窗根底下过，听到屋中琴箫和鸣，甚是优雅。往窗子里一看，原来是小虎子正拉二胡，爸爸吹箫，父子合奏。老头善吹，凡有孔就能吹出旋律。儿子的琴艺也不错，赵家七八岁以上的孩子都会一两样乐器。回到屋里，我还没有坐下，忽然听到外边巨响轰鸣，然后是尖叫声、钝器声，还有桌子翻、瓷器碎的声音。我想赵家之外，还有哪家能发动如此响动的内战？待出来一看，就是赵家，老头以箫作为棍棒追打小虎子，小虎子不时地从地下捡起什么就回头向老爸投掷，老爸不时躲闪。街坊出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才把他们拉开，父子在劝架的拉扯下还在不停地对骂。我很奇怪，小虎子的妹妹跟我说，本来父子俩玩得挺高兴，不知因为什么，小虎子恼了，拿起个茶杯就向老头掷去。老头反应很快，马上用箫拨开。琴箫交锋，桌子翻了，茶壶茶碗碎了，从屋里打到屋外，那么大院子还不够他们施展拳脚，一直追逐到街上。

还有一次也是震惊全院的。那天老头与一位老友闲聊，小虎子回来了。闲聊时老头说到家中情况，老友有点倚老卖老，拍起老腔：“小虎子，不是我说你，你敢打爸爸，这就是忤逆！过去送到衙门，甬审，马上拉出去，千刀万剐。”说着自己也真的动火了，站起来用文明棍（拄杖）敲地：“新社会也不能没王法！”小虎子是顺毛驴，好言好语劝他，他还能听进去，一听老友这种没有历史感的教训，马上也火了，指着对方的鼻子：“你别猖狂，我连你一块揍！”于是老头、老友二位真的与小虎子干起来了。不知小虎子哪里找了把菜刀，高高举起，二老一看，怕他动真格的，马上跑出屋子，老头喊：“杀人了”，老友高呼：“造反了，造反了。”街坊们也赶紧跑了出来，一看小虎子举着菜刀追，老俩围着大殿跑，一时谁也不敢上手，后来还是老傅家的儿子从侧面把菜刀抢了过来，抱住了小虎子的腰，俩老头才停下来喘口气，被街坊劝回屋子。赵家打架，上场的不只是主角，只要一开打，绝对是党同伐异，各方向着各方，都有不同程度地卷入。唯有两个人卷入不了，一是大房的老太太，她患了子宫癌，恐怕时日无多，小虎子与他爸打架多是为了他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也气他妈，骂他妈是“老白毛”。另外一个对此充耳不闻的是老头的父亲，他卧病已久，就盼一死了。

这个夏天老爷爷泻肚了，只坚持了两三天便撒手西归。解放初，旧习俗还保留着，丧事很繁杂，花费很大。如要雇门吹（在丧家门口吹曲），要有“接三”，请僧侣做法事，出殡等等。花销虽多，但只要经济条件一般的，都不能免。赵家对此是一概全免，停了一天，就把老爷子烧了。当时火葬还极稀少，老爷子自己也预先买下了寿材，存在棺材铺里。老爷子的死弄得院中议论纷纷：“大夏天的，让老爷子吃荞面韭菜猴顶灯（又叫糊饼，把和好的面摊在热铛上，上面放上韭菜馅），老爷子还不拉稀？”“把老爷子烧了，把棺材卖了，他办这个丧事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一笔。”随着老太太也走了，这办得更简单，一烧了事，连出嫁的大姐也没通知，后来大姐哭着回来，大闹了半天。她边哭诉边骂，院里老街坊也掉了泪。老头子躲在屋里一声不吭。

此后不久，街坊傅大妈与儿子生气，突然休克，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街坊们有的掐人中，有的为她盘腿，一会儿大妈长出了一口气。大家说：“好了，缓过来了。”此时发生了件怪事，大妈的声音变了，是男声，细一听是赵家老爷爷的声音。他数落儿子如何不孝，如何不是东西！口吻内容极肖，说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赵家老头听说了，气得从屋里跑出来，指着傅大妈的鼻子骂自己的爸爸。围着看的人想笑又不敢笑。这场闹剧，持续了半个小时。

从小住独门独院，对于外界的事知道的很少。搬到关帝庙，让我懂了许多人间事。

我与“第一本书”

我不是出生在读书人家，何况我们山西人在百年前也不讲究读书，这一点与江浙人大不相同。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清末）的山西人是有钱的学买卖（经商），没钱的学手艺，做手工业者。父亲属于没钱的一类，读了四年私塾，只读到“上论”（《论语》上半部），便被家里送到手工作坊学织地毯。民国初年，父亲16岁到北京来闯天下，算是最早的“农民工”吧。不过到我出生时，已经家道小康，懂得要培养我早点读书，所以在三岁时便请人教我认“字号”（一种识字卡片，正面是字，背面是图），四岁上幼稚园，家里除了父亲订的一份《新民报》外，几乎没有供阅读的东西。家里有字的而且装订成本的，只有每年一换的《皇历》。没事时，也翻过，留到现今记忆中的只有“龙治水”，因为一翻开《皇历》赫然印在第一页的就是威猛的神龙张大口在吐水，如果画的是一条龙，那么就是一龙治水，本年非大旱不可；如是“九龙治水”则本年度非大涝不可。

不过《皇历》算不上是书，我读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本没书皮的《名贤集》。这是本从四字句到七字句劝人行善的格言集，现在看来其中许多是很庸俗的，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之类，体现的是小市民意识。但也有好的，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之类，属于通俗化的儒家思想，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感觉十分惬意。这对于大脑还处在空白状态的小孩是很有吸引力的，没事的时候读一读，仿佛有点感悟。后来上初中时，初读《论语》，便有似曾相识之感，格外亲切，可能就与这本《名贤集》有关。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客人丢在家里的残破不堪的《三侠剑》。上三年级时发现这半本没头没尾、不知书名的“书”，一读，有故事情节，有悬念，有神秘的武功：“金镖将胜英——胜子川一口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压盖绿林，甩头一子定乾坤”，在“扬子江心倒吊八百里”。这种英雄气概和盖世无双的武艺，会激起当年的男孩儿什么样的幻想？大约是现在的男孩儿难以理解的了。记得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残书摊在桌子上，然后跪在凳子上（坐着不够高）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自得其乐。一旦有事中断，便用毛笔帽，蘸着红印泥，盖在中断的地方。半年下来，破书满篇尽是红圈圈。过年时，逛厂甸，非要买“鱼鳞紫金刀”不可，无奈玩具摊上没有，只好买了一把“九连环宝刀”，聊以自慰。对武侠小说的爱好延续到初中，初一时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作者是郑证因、白羽、徐春羽、还珠楼主；书是《鹰爪王》《子母离魂圈》《十二只金钱镖》《蜀山剑侠传》之类，每种都是五六十集，一天要看两三本，没完没了。因为

书是租的，在课堂上也要加班看，还要担心老师没收。这种阅读狂热就与这半本《三侠剑》有关。不过在师大附中初中三年生活中，只被老师没收过一本书，还是《鲁迅小说选》。

第一本自己买的书是世界书局的半图半文的《史可法》。1947年底，快过年了，父亲带我去沂园澡堂洗澡，沂园在杨梅竹斜街，洗完澡，父亲问我要什么，我说“书”。沂园东侧有个文具店，代卖书籍，多是儿童读物。《史可法》这本书类似现在的小人书，但不是小本装订，而是32开本，每页分若干格。至今尚能记得的是史可法还是穷书生时进京赶考，没钱住店，住在城郊的破庙里。正赶上巡城御史左光斗，巡查到这个庙里，看到和衣而睡的史可法，书本还丢在一旁。左光斗同情这个书生，便把自己的皮裘盖在史可法的身上。从这个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好学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好品质，受到社会的赞美和尊重。这种认识使得我对在1957年之后整个社会鄙视读书的风气特别不能理解。

上初中才懂得除了小说外，文学作品中感动人的还有诗词。师大附中图书馆在北京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我从图书馆里借过许多诗词选注和论述诗词的书籍。但我自己买的第一本词选是1957年出版的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买书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住校，校址在和平门外，书店在西河沿东口的劝业场。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吃完晚饭后，就步行到劝业场，一到门口，我感到气氛有点不对，不像往常自然，但我没以为意。大约七点钟，全场封闭，一批批青年人被铐走，才知道是围剿流氓，到很晚才放顾客回家。这次买书给我留的记忆十分深刻，不过还是买了一本好书作为补偿。晚唐两宋是词创作的高峰时期，自古唐宋词选无虑数十百种，龙榆生选本是我买的最早的词选本，也是最佳选本。后来我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诗歌的研究，读过数十种唐宋词选，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选的，都没有超过此本的。初学者读好的选本，不仅是尝一脔而知鼎味，更重要的乃在于得门径之正，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词。如果你从《红楼梦》的诗词开始读诗词，把它视为最佳之作（当然《红楼梦》中的诗词也自有其所长），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识，此后就难以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好词了。

我读第一部非文学的书是《论语》（当然它也有文学性，讲文学史也要讲它，但就整部书来说还不属于文学），是初二时（1955年）在琉璃厂富晋书社买的。当时我在北师大附中上学，每天都从琉璃厂过，有空就在旧书店转一转。因为听父亲说过“‘上论’‘下论’难死人”，突然有一天看到线装铅印的民国版《论语》，很好奇，就拿起来翻一翻。一看有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民无信不立”一类的话头，并不难懂（这些都是《名贤集》中有的），就买了一部，共六本，三角钱。那时线装书中以经部书最便宜，清中叶以来坊刻本平均二三分钱一本。我这六本三角还算贵的，其原因是书的品相好，纸白字大，正文相当我们常用的三号字，注文是小四，看着特别舒服。这三角钱就是我三天的早点钱。后来还买了许多部“扫叶山房的石印本”的书，如《世说新语》《姜白石诗词集》《嘉祐集》等，也贪图它纸白，字漂亮（多是手写楷体），蓝色布套，装帧淡雅大方，又便宜（平均五分钱一本）。后来才懂得这种石印本，错字多，不仅不是好版本，连做读本都不适宜。我从初中开始自己买书，到大学毕业也买了近千本书。那时过眼的好书、便宜书太多了，就是没钱。那时每当自己想买零食或其他物品往往会把所要花的钱折合成能买什么书，这样常常就放弃了原来计划，把这些钱拿去买书了。不过，我那近千本书，文革当中也没有完全保住，损失了不少，文革一结束，真是痛心疾首，现在老了都看淡了，有人说，你过去买的线装书都成了文物了，很值钱呢！对我来说，书就是书，买它的时候要考虑到钱，买到家之后，它就与钱没关系了。